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11月17日

文化长廊

从古文经典引用看习近平治国理政

□谢经荣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他说：“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可以看出他对古典诗词、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纵览习近平同志过去20年的一些著作，如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的《摆脱贫困》、主政浙江时的《之江新语》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以及自2012年11月份以后的重要讲话，我被其中所引用的古文经典吸引，并抄录下来认真学习。在学习的同时，我又受到了一次传统文化的熏陶。

习近平同志不仅古文功底深厚，在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从这些古文的引用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我们党治国理念的一些内在关联。

立足高远和战略思维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可见，战略思维至少包括几个要素：全局、整体的视角，发展、变化的视角，关键时刻关键作为。他引用“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说明在行动中需要考虑大小、缓急、上下、内外等诸多因素，实际就是强调从全局、从整体看问题的重要性；引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强调要善于谋划，善于以近见远、以小见大、以微知著，提高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引用“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强调要着眼长远，多思考改革发展的大问题，而不能过于注重个人得失，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眼前，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引用“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强调目标贯彻中的递减效应，启示我们在制定战略时要充分运用管理科学的分析方法，力求方案的科学可行；引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明要善于判断事物发展的趋势，并要以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证态度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引用“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强调判断是非、作出决策必须以全局利益作标准，摒弃个人、局部得失。

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一种思维技巧，核心是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且接受这种情况，注重对危机、风险、底线的防范，凡事从坏处准备，争取好的结果，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在看待、应对患难、危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智慧，总结出诸多的名言警句，习近平同志对这些名言警句的引用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其现实意义。如：引用“祸患常积于忽微”，强调细节的重要性，强调忽视细节、微小错误的危害；引用“居安而思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强调只有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提前管控，才能“防患于未然”；引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指出我们面对复杂形势应当持有的态度和作风，应当树立的思考方式。

脚踏实地和务实精神

习近平同志履新不久就赴改革开放的发轫之地深圳，重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勤勉务实的作风，体现在带头提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体现在扎实推进改革的步伐，同样体现在清新、朴实的讲话中。如讲到文风时，引用“文可载道，以用为贵”，强调作风应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避免官话套话、夸夸其谈。讲到学风时，引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强调认识事物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切不可自以为是。讲到工作作风时，引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强调工作一定要立足实际，从实际出发，务求实效，避免主观臆测、拍脑门决策；引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强调坚持不懈、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道理，我们推进改革正需要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总言之，“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不仅是古人行事的准则，同样也是我们培养求真务实作风的要求。

民本思想和为民情怀

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中向来有民本的思想传统，如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北宋张横渠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元素，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一致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这种传统。习近平同志国学修养深厚，对此自有更深的体会。他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勤政为民的重要性，由此也可引申出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所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体现；尤其是在多次讲话中引用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教导干部一定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的位置，切身体察人民的疾苦，凡事以民生为导向；引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我们为人民服务应有的精神和态度。通过对这些经典词句的学习，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理解，更使我们体会到总书记深植内心的为民情怀。

修身立命和自律意识

中国传统士大夫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以现代视角理解，加强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事业观，同样是我们提高干部素质的首要任务。习近平同志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强调干部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为政的基本条件。具体而言：“为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修身有几方面突出的要求：其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洁身自好、廉洁是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取信于民的前提要件；其二，谨言慎行，严于律己，“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党员干部只有谨慎约束自己的言行，才能树立起威信，保证政令的畅通；其三，勤勉尽职，敢于担当，“为官避事平生耻”，这对一些庸官、懒官无疑是最好的警示。

知人善任和干部队伍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并在其他一些会议讲话中多次谈到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等问题，其中同样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注解自己的观点。首先，人才工作对于执政至关重要，“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其次，对人才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再次，识别、选拔人才有一些标准：以德为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有基层实践经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好学精神，“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自省意识，“吾日三省吾身”；清正廉洁，“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总之，习近平同志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给一些古文经典赋予了极具时代性、现实性的新含义，融会贯通，恰到好处，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思考。

乡村教育不可简单城市化

□陈旭峰

当前乡村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乡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导向，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使乡村教育走入了困境。那么乡村教育如何才能走出发展困境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重构乡村教育的政策导向

我国乡村教育城市化的政策导向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个阶段，会直接影响政策效果。从政策制定层面来说，当前的乡村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农民的意愿，从而使得乡村教育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政策制定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乡村地区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特殊性，而只是按照城市教育的模式来制定乡村教育政策，从而使得乡村教育政策与乡村地区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不适用性。国家出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国家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把农村学校集中到县城、集镇去，按照城市的模式来发展乡村教育，让乡村孩子接受跟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那么乡村教育就能够实现快速发展了。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当乡村教育这棵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城市之后，乡村教育已经日渐凋零，更不用说“开花结果”了。从政策执行层面来说，地方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乡村地区、不同教育对象对乡村教育的需求差异。举个例子来说，我国西部乡村和东部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那么西部乡村和东部乡村对教育的需求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充分考虑到乡村教育需求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乡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分析，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考虑到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不要照抄照搬城市的教育模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必须要充分考虑乡村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需求差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做到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

确立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

乡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导向与乡村教育主体地位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乡村教育是附属于城市教育的。当前我国的乡村教育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乡村教育中很少有乡村自己的内容，传授的基本上都是关于城市的内容。虽然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开发各种各样的乡土教材，但是我们发现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乡土教材的“乡土性”还是远远不够，更多的是“地方性”而不是“乡土性”，对乡村的针对性还是不强；有的地方乡土教材只是一种摆设，并没有把乡土教材的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传递，乡村元素在教育中的缺失使得乡村原有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也是以乡村文化的遗失为代价的。这也决定了在教育体系中乡村教育只能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乡村教育是为城市服务的，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乡村人才的培养成为了一个“空中阁楼”。第二个问题是乡村教育偏离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一直按照城市化的方向在发展。当前的乡村教育非常强调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模式来发展，不断加强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的统一化、标准化力度，要让乡村孩子可以享受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乡村教育发展的误区，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陷阱”。这种乡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这样的乡村教育永远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在乡村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乡村教育的独立地位，不能一味地将乡村教育整合到城市教育当中去。乡村教育既要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提供有用人才，也要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应该确立乡村教育的主体地位，改变地方性知识、乡土性知识在乡村教育中“失语”的现状，不断加强乡土教材的开发和应用，树立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让乡村教育真正服务于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保持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

乡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导向与乡村社会主体地位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乡村社会是附属于城市社会的。要实现乡村教育由城市化向现代化方向转变这个目标，光从乡村教育入手是不行的。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不管是对于城市还是对于乡村来说，现代化都是其发展方向。但是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乡村的现代化往往是按照城市化方向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发展比较快速的地域，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乡村。可以说，城市化与现代化存在较多的共同特点，但是现代化与城市化不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一味地照抄照搬城市的发展模式。第二个问题是乡村的现代化是以摒弃乡村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对不能共存的矛盾体，乡村应该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共生。可以说，摒弃传统的现代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样的现代化是没有“灵魂”的。现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各种“农民上楼”运动就是这两个问题的集中表现，政府同样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农民都“上楼”了，乡村就实现现代化了。政府不知道的是：“农民上楼”运动使得大量的村庄消失了，严重破坏了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乡村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乡村教育如何能够存在呢？此时乡村教育就犹如失去了躯体的“魂魄”四处飘荡，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决定了只有从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位入手，也就是改变当前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乡村教育发展方向的转变。为了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的转变，应该注意保持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不能一味地将乡村的发展按照城市化的路径去走，应该明确现代化才是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应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乡村对于城市的附属地位，缩小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差距，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构建“三位一体”乡村教育体系

乡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导向还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乡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桎梏，学校教育一度成为了教育的代名词，一谈到教育似乎就是指学校教育，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似乎就不能称其为教育了，正是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在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的缺失表现为父母忙于外出打工挣钱，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很少对孩子进行思想和道德上的教育，亲子之间的沟通非常有限，关系趋于淡漠。社会教育的缺失表现为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活动非常少，乡村孩子缺乏乡土知识、乡土生产技能方面的教育。正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缺失，使得当前乡村教育生态被严重破坏，其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致使城乡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乡村的教育生态是平衡的，这种平衡正是来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乡村教育体系的构建。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晏阳初提出用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教育方式来落实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医治愚、贫、弱、私四个大问题。那么，具体来说，应该怎样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乡村教育体系呢？笔者认为，从乡村学校教育来说，学校应该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更好地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配合。在学校教育中要加强对学生社会知识的传授，通过开放式教育来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更多的准备；从乡村家庭教育来说，家庭要积极配合好学校教育，同时要加强对孩子进入社会之后应该如何做人做事的教育；从乡村社会教育来说，社会要发挥开放式教学的优势，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同时要善于利用学校、家庭的教育资源，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只有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配合与努力下，乡村教育才能真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问题谈

文化视野

儒家兼济精神的当代价值

□王皓月

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最核心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助于世界认识当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人与自我的矛盾以及个人与他人的矛盾日趋突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因此，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兼济精神，将之吸纳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教化作用，对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价值。

兼济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瑰宝

从历史上来看，兼济精神作为中国人道德规范、精神动力和人生指南，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指出了共同的方向和道路。《论语·泰伯》之中，记载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主张，而孟子则将“见”和“隐”具体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奉儒家为正统的士大夫阶层，将孔子和孟子的观点作为人生信条，认为人在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而得志时则要为天下万民尽义务。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映的正是儒家的兼济精神。这种精神境界是“仁”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体现了中华文明高度的人文自觉和道德水准。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色彩强烈的价值观，其关注点在于君子行为、政治秩序、道德伦理等，所以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国家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出仕为官并兼济天下也成为古代文人最大的追求。不过，在政治斗争残酷、社会秩序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社会责任感淡薄，清谈、玄学、饮酒、服食等流行，士大夫阶层独善其身的倾向十分明显。但即便是在当时，儒家兼济精神依然影响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并对中国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是，促使主张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超越了以个人解脱为目标的小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且让道教从追求个人成仙变为以度人为先。自南朝之后，儒、释、道三家之说共存互补，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基础，三家所共同倡导的兼济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兼济精神以新的内涵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种外来新思想只有融入原有文化才能被接纳。中国古代儒家即有大同社会的构想，但主要是精英阶层的口号，而儒、释、道所共同推崇的兼济精神更具影响力，在近代构成了接纳社会主义的土壤。

相比西方重视契约关系和权利的特点，中国更重视伦理关系和责任。特别是儒家思想以人为中心，关注社会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从中看不到西方宗教之中的神，人性不居于神性之下。所以，人的社会属性受到重视，人的义务得到强调。如荀子所说“人之生也，不能无群”，作为兼济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认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先于个人私利，这与社会主义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要想兼济天下，首先要做到独善其身。人即便不能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也可以成为追求理想人格的“内圣”。现在很多人自我的欲望不断膨胀，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抱怨社会的不公，进而违反道德甚至法律，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利。即便在利上占了便宜，却丧失了更宝贵的义，精神上的空虚和不满依然难以得到解决。反之，那些乐善好施、勇于担当的人，不论经济状况如何，都拥有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相比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似乎有消极的意味，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这是儒家价值观对于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达而不愿兼济天下，不是真善；同样，无法善其自身，更不可能兼济天下。如果暂时不身居其位，但能以高度的道德自觉约束自己，避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虽然这是一种道德底线，但也被包含在兼济精神之中。从日常生活中形成兼济的心态，对于解决普通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普通国民需要有兼济精神，身为执政者的党员干部更是如此。有些人在没有做好独善其身的情况下，还是被赋予了权力，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反而会以权谋私，走向腐败的深渊。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发现一个现象，身边“吃拿卡”的官员确实少了，但“无作为”的官员似乎多了。某些官员私下说，宁可不做事，也不要做错事。没了回扣，为地区谋发展的积极性低了，收了专车，下基层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这正是因为，他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将权力和地位当作了钱权交易的工具，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自己有回报人民的责任。

共产党人需要兼济的“天下”在当代可以引述为群众，践行兼济精神，就是要走群众路线。放眼天下，树立群众观念，而不是盯着个人的得失，“修己以安百姓”。还有的干部，原本工作认真负责，但到了一定年龄，感觉提拔无望，就抱怨没有获得发挥才能的空间，丧失了热情。殊不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者，必然能有独善的觉悟，何况很多岗位与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怎么能说是“穷”呢？党员干部原本也是来自群众，社会分工的不同让其获得了权力，兼济天下不正是“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的最好体现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如果都能以兼济精神修身养德，何愁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何愁政令不行呢？

兼济精神不仅是普通国民、执政者的精神财富，更是一个国家的宝贵品格。正如《尚书》提出的“协和万邦”，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共赢的相处之道。“大国责任，兼济天下”，21世纪的世界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中国目前比较贴切的国际身份。虽然人均经济指标还相对落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中国整体的体量和影响力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对此不必妄自菲薄，要以更成熟自信的心态参与国际事务，树立正面的大国形象，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国的正能量。以兼济天下而非独霸天下为理念的外交，也有助于增加我国的话语权，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

融合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依据。要摧毁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其历史，特别是要消灭其文化，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屡次从支离破碎走向统一复兴，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分，但判断的标准绝不是时间上的新旧，新兴文化之中也许包含了消极的因素，而传统文化之中可能保留了人类永恒的价值理念。我们有责任以文化软实力保证国家的思想文化安全，保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途径，复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让其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文精神融入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题中之义，更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